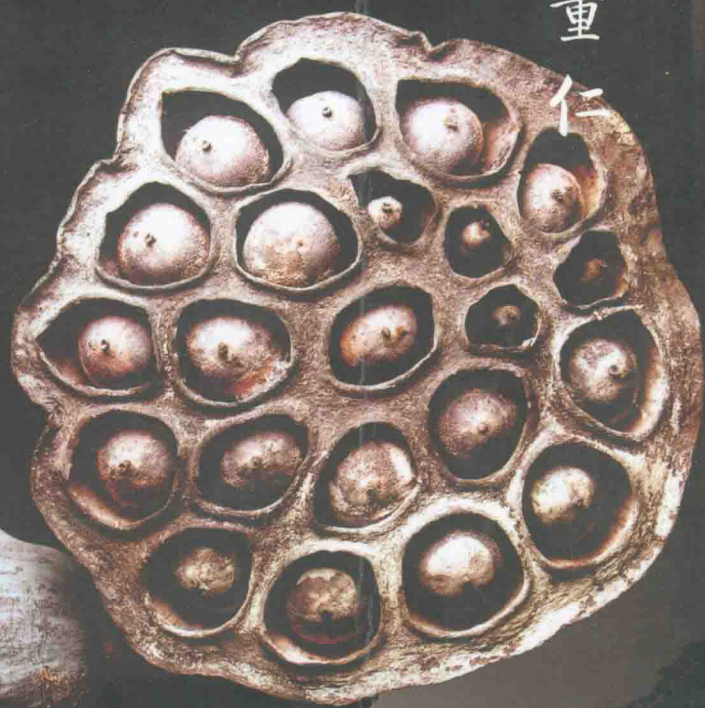


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 学术年谱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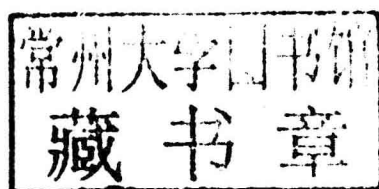
杨荣祥 董仁



吉林电子出版社

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学学术年谱

主编 杨荣祥 董 仁



吉林电子出版社

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学术年谱

辽宁省语言学会“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会”指导

主编：杨荣祥 董 仁

编委：孙华龙 张 芳

王 萍 高 明 胡 伟

出版发行：吉林音像出版社

电话：(0431)86012909

经销：新华书店

出品人：王保华

主审：李 捷

装帧设计：石 磊

字数：469 千字

版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社址：长春市泰莱街 1825 号

邮编：130062

印刷：豫兴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吴 俊

审校：吴延甲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9.25

印次：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9454-135-2

定价：45.00 元

创新：吴士文精神的灵魂

——《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年谱》序

辽东学院师范学院“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会”为我国学术界办成了一件值得推崇的大好事：经过五年的艰辛努力，从多方设法搜集到的百余万字原始资料中，经过编辑整理，编成了这本魅力四射、感人至深的《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学术年谱》。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丁世洁博士也办了一件大好事：当此书因缺乏经费无力付梓时，便慷慨资助并努力使之顺利面世。本书的编辑出版，也凝聚了吉林电子出版社编辑吴俊先生，以及丁教授之先生李捷总编和《教育科研论坛》杂志参与设计、编校编辑的大量心血。我想，士文兄在天之灵有知，也定会深表谢意和深感欣慰的。

由于本书主编之一董仁先生代表“研究会”一再邀请我作序，数日前丁教授又将排印毕的《年谱》底稿送达我家，并曰急等出版。我即放下手头正在撰写的另一书稿，集中精力先将本书稿通读了一遍。于是，士文兄活生生的形象，又一次地重新出现在我面前。从1980年至1996年，我与他学术交往达17年，并结成挚友。交往中，他的一股坚持不懈的特有精神每每感染着我。是否可以把这种精神称之为“吴士文精神”？而不断追求创新，就是“吴士文精神”的灵魂！

这本《年谱》真实地记录了吴士文先生从1951年至1996年40多年不断创新的足迹，其中不少事迹引起了心灵的震撼。我想，全面总结吴士文修辞学创新的经验，对我国修辞学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

吴士文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学术创新的一生。愚以为他在修辞学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创新——

1. 修辞学学术的创新

吴士文修辞学研究中最突出的创新是在修辞格研究方面。辞格研究是一个被众多学者关注了几十年的老课题。而士文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既深又新。他对辞格理论和辞格结构的探讨很有系统，不但对辞格的定义、范围、类别、理论基础、辞格与非辞格的界限等，有独到的理论阐述；对辞格结构如何公式化、模式化，也创见迭出，闯出了一条新路，给人以启迪。同时，他又是辞格史探索的先驱者之一。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在全国也居于佼佼者之列。迄今为止，时光又流逝了十多年，环顾全国，在辞格研究这个领域，士文的探索依旧代表着我国的最高水平，至今尚无人超越。

与此同时，他对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所说的“消极修辞”（吴称之为“一般性修辞”，即“辞规”和“辞风”）的探索，也有不少创新，论析较前人深细，不但集中体现在《修辞讲话》等论著中，还包含在组织有关同仁集体攻关的成果里。关于语法、修辞关系的创新，士文首次提出了在两者的关系中，修辞起主导作用的观点，与一般认为

语法起主导作用的观点大相径庭,因而语惊四座。此外,还有将辞格纳入公共关系领域的多种创新等,均引人注目。

2. 修辞教学的创新

吴士文一生心仪修辞和修辞学,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探索着怎样将修辞的内容融入大学和中学的语文教学之中。他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即与同行历时数年主编了《现代汉语修辞学》,于 1984 年出版,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最早问世的大学修辞教材之一。之后,他又不辞辛劳地联合其他同仁主编《中学语文多角度解析》12 册,于 1987 年出版,深受大学和中学师生的欢迎。由于修辞因素大量融进语文教学,因此他的教学效果出奇地好。请看以下几段赞美辞:

我清楚地记得在丹东师专,在丹东市自学成才学院,吴先生的多次讲课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境。讲完之后,全场静穆,然后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学生围住吴先生,久久不愿散去。这难道不感人吗?(曲德来:《吴士文教育学术成就百人评》)

老师们说学生很爱听吴先生讲课,每次面授都听不够。有一位学员在沈阳函授站听完吴老师的课后,又跟到本溪继续听。那时学员参加面授,差旅费等都是自理。学员宁肯多花钱也在所不惜。还有的学员给领导来信说:“听吴老师的一堂课是终身的幸福。”(刘继才:《人生的价值在创造》)

“俺老师的课抓人啊,那地方掉根针都能听见。”(赵敏、刘晓强:《春风送来一支歌》)

“现代汉语”本来是一门颇为枯燥的课,士文兄能取得如此出色的教学效果,没有呕心沥血的创新,能做得到的吗?

3. 营造和谐的修辞研究环境的创新

运用修辞要构建和适应和谐的题旨情境,这是《修辞学发凡》提出的创见;研究修辞要营造和谐的环境,这是吴士文毕生奋斗创造出来的经验。

(1) 倾全力推动中国修辞学会的建立,营造全国修辞研究良好的大环境。《营口师专学报》1988 年第 2 期刊出了吴士文《中国修辞学会筹备经过报告》,其中虽将我列为 24 名发起人之一,但据我所知,吴士文是其中起重要作用的组织者。如发起筹备成立学会期间,仅 1980 年 3 月至 5 月,他就给胡裕树先生和我写了四封信。推而论之,他要给全国那么多学者写多少封信?对方表态后,他还要复函,这得花多少时间?因此,中国修辞学会创建人之王的希杰曾说:“在中国修辞学会的发起过程中,他(吴士文)是最辛苦也是出力最大的人中间的一个。”前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郑远汉称吴士文在筹备过程中“起了擎天柱”的作用,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学会成立后,吴士文多年担任副会长,他做了许多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当时,中国修辞学会领导全国会员开创了我国修辞学的新局面。应该说,其中有着吴士文的很大一份功劳。

(2) 为了中国修辞学的繁荣,坚持助人为乐。士文兄待人热情如火。他患癌症之后,还同时主编《营口师专学报》、《鞍山师专学报》、《铁岭师专学报》等三家学报的“修辞学专栏”。1992 年 8 月 29 日他给我的信中透露了主编专栏的原委:“三个学报(专栏)的开辟,深层意义就是为朋友排忧解难。”当刊物编辑,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健康人尚且觉得负担很重,何况是癌症患者,更何况是身兼那么多社会职务的学者?没有高尚的情操,不可能主动承诺,承诺了也难以继。

再有,据本书主编杨荣祥先生统计,士文兄“给人写的书序和评论就有 38 篇之

多”。(《秋深枫愈红》)请算算,这得花费他多病之身的多少时间和心血!

与此同时,他作为《修辞学习》杂志的顾问,还在该杂志经费拮据之际,多方为之拉广告,帮助杂志渡过了难关。此外,他还帮助朋友向出版社推荐书稿。这两点,我在五年前所写的士文纪念文章中已说过,在此就不赘述了。

总之,士文兄坚持助人为乐,在自己周围营造一种和谐融洽的氛围。难怪他多次出面组织集体攻关项目时,应者如云。也难怪他一有什么事需要别人伸出援手时,对方定会热情相向。助人为乐,“得道多助”,这应该是士文兄通过自己的实践,所创造出来的一条“工夫在诗外”的宝贵经验。

二

纵看吴士文的一生,他为中国修辞学所做出的贡献颇多。梳理一下他是怎样做到持久不懈地创新的经验,认清他创新时所走的道路,会为构建我国修辞学遗产宝库,增添一笔重要的财富。

1.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树立创新的理念

吴士文从事修辞学研究,是从全文抄录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开始的。1948年,刚任辽宁省立新民师范语文教师的吴士文,好不容易借到了一本《发凡》,就如获至宝地工工整整抄了一遍。之后,他不知将这部修辞学经典读了多少遍,对有的重点章节还能背诵出来。为此,他一直自称为陈望道的“私淑弟子”。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继承该书论点的精粹,他的做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力求创新。他常说:“人活着,是为了创造。只有富于创造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转引自曲德来《吴士文教育学术成就百人评·前言》)这个新理念十分宝贵,只有建立了不懈的创新理念,才会有不断创新的动力。

2.培养创新思维,开辟创新之路

吴士文时刻重视创新思维的培养,思考问题多有特殊的角度,这就是他往往能开辟创新之路的重要原因。就以他对修辞格下定义来说吧,他把修辞格看成是一个“特定的类聚系统”,既重视从整体上、宏观上对其进行系统的考察;又重视从微观上对每个辞格进行结构上的独到的分析,把它们看做是一种“模式”,并将其分别归类。因此,吴氏以下定义迭受好评:“辞格是在言语活动中长期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特定结构、特定方式、符合特定类聚系统的模式。”这是一个被公认为迄今为止颇能揭示辞格本质特征、科学性颇强的定义,受到众多同行的赞扬。

但是这个定义并非一蹴而就,它与士文兄其他创新思维一样,是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艰辛思索的结果。本书主编杨荣祥在《秋深枫愈红》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吴士文在探索、钻研修辞科学规律时,真正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一次坐火车思考修辞问题,竟乘过了站;一次走路时思考论文结构,竟撞到电线杆上,差点说声“对不起”;还有一次买白菜,交款开完票,便揣在兜里继续思考修辞问题,等问题解决时,白菜早卖光了!-----一次是他骑在自行车上,脑海中翻腾着各种修辞方式的浪花,以至于迎面而来的一辆柴草车也视而不见,一头扎进柴草车中间。-----最可怕的一次,是他骑自行车想着论文,碰上牛群也来不及躲闪,闯牛阵的后果是摔得左臂严重骨折!谁能想到,在接骨过程中,他又开始研究起闯牛阵时所想的修辞问题,他终于在病愈前

弄清了摔伤前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个修辞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即《辞格结构形式初探》中所谈的四个结构问题。

我们今天向吴士文学习,并非也提倡大家骑自行车去闯牛阵,而是应该努力学习和发扬士文兄热爱修辞学,入迷地钻研修辞学,寻找修辞学的薄弱环节,奋勇攻关,不畏艰难,为不断提高修辞学科的学术水平而努力奋斗的那种精神。

3. 尝试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士文兄科研和教学上的持续创新,是与他不断尝试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分不开的。如他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既重视语言理论、修辞理论密切联系教学与社会实际;又重视运用辩证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修辞现象,因此诸如对“辞规”与“辞风”的论析,就很有说服力。他还多方面运用系统论方法,同时重视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关系的辩证处置,等等。由于不少学者对这方面已多有评论,恕不赘述。

三

士文兄 70 周岁的灿烂的一生虽是短暂的,但他给我国学术界留下的异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却是永恒的。像他这样德艺双馨、不断攀登学术高峰的学者在修辞学界并不多见。值此面临我国文化大繁荣前夕的重要时刻,我曾不断向有关学会、高校建议要重视组织力量,总结吴士文及所有已逝去的修辞学家科研和教学的宝贵经验,并大力弘扬之。因为,我们需要涌现更多的像吴士文那样德才兼备的修辞学者,为的是让修辞学能跟上并符合我国飞速发展的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例如,2009 年 6 月,我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修辞学会 2009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所作的主题发言《略论郑子瑜先生的学术创新》末尾,曾发出这样的呼吁:

包括子瑜先生在内的一批已经逝去的修辞学家,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学术遗产,他们的创新经验是中国修辞学一笔无比珍贵的重要财富。怎样高度重视总结已经逝去的所有现代修辞学家留下的学术遗产?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零敲碎打,应该整体安排。丹东辽东学院师范学院组织了“吴士文研究会”,在总结和弘扬吴士文修辞学遗产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这是可喜的现象。我建议中国修辞学会和各大行政区、省级的修辞学会组织专门人员,采取有力措施,对所有已经逝世的修辞学家的学术遗产,进行系统的总结,为新一代学者的创新,提供有力的借鉴资料。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又如,在辽东学院师范学院酝酿成立“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会”的过程中,我也多次向他们提出各种建议。一个学校,能为一位杰出学者专门成立其“学术研究会”,并有一批教师投身于此,孜孜不倦,研究成果迭出,这在中国修辞学界乃是一个创举。据我视野所及,还未见国内有别的高校成立过类似机构来纪念业已逝去的修辞学家。因此,我认为应该向辽东学院“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会”的朋友们的创举和所做出的无私奉献致敬!他们从搜集到的 100 多万字有关吴士文事迹的原始材料中,花了许多时间精选出 30 余万字成品。要知道,仅仅从数百封字迹潦草的双方来信里,挑选出合适的 170 多封信件,已经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再以搜集材料过程中的艰辛为例,当“研究会”得知我手头藏有士文兄早年给我的百余封来信时,即派编委张芳老师从偏远的上海浦东新区,倒几辆公交车到位于杨浦区的寒舍,仅在路程上往返即要三个小时。她还

要将信件送到复旦南区复印店一封封复印,复印毕又要送还。时值那年盛夏,人坐着不动尚且要出汗,她往返奔波肯定大汗淋漓,为这一小事即花去她整整一天时间!仅此一件,即十分艰苦,更不必说编这部书所付出的全部劳动了!不过愚以为,为士文先生召开一两次纪念会,编成一部《年谱》,仅仅是“研究会”众多计划中的一部分。“吴士文精神”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宝库,不仅他的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值得总结,他的语文教学和修辞教学的经验也同样值得总结。与此同时,他的为人,他的“以德为先”的言行,他的红透专深的表现,都值得发扬光大。但是继承吴士文学术思想还仅仅是第一步,在他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把修辞学事业进一步提高到新的水平,才是后来者更为重要、更需全力以赴去完成的任务!

吴士文是划过我国修辞学长空的一道闪电,瑰丽而又令人震撼。希望能以他为榜样,涌现出更多吴士文式的修辞学家,为我国文化的大繁荣,为我国修辞学研究在世界修辞学之林中焕发光彩,作出更大的贡献!

宗廷虎

(中国修辞学会顾问、辽东学院师范学院“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会”顾问、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

2011年9月15日于复旦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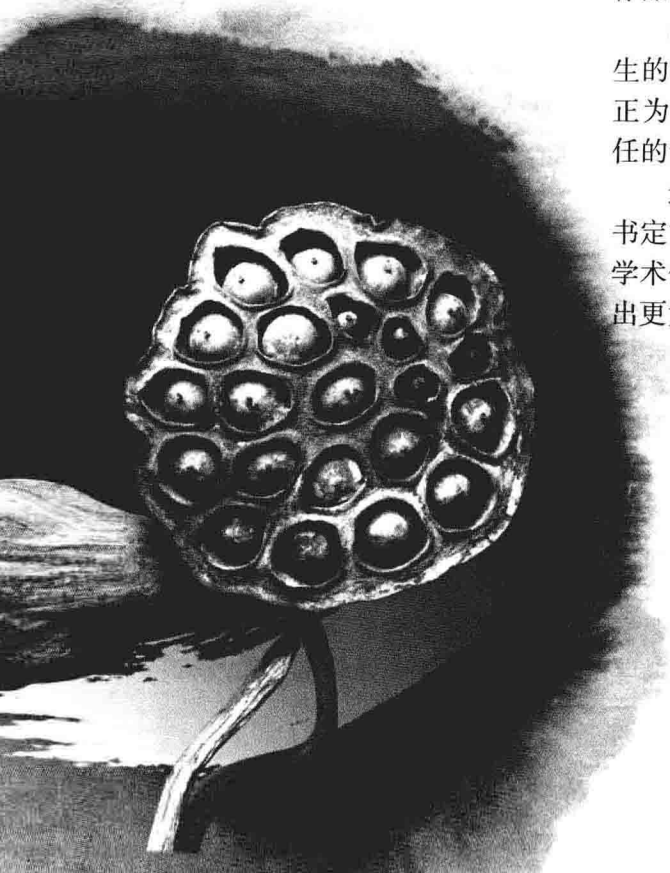
《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学术年谱》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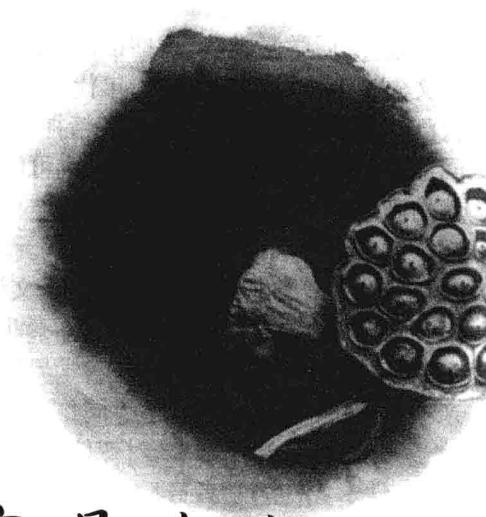
《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学术年谱》是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也是辽东学院师范学院“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会”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本书编者历经五年的努力,从吴先生家属、亲友、学界同仁、报刊等,搜集了百余万字的原始材料,经过认真分类筛选,考订核对,梳理编缀而成。

本书体例为编年体,以学术成果发表时间为序,共搜集吴士文先生自1951年至1996年发表论著103篇(部),另有1篇未发表过的遗稿,计104篇(部)学术成果,是截止目前国内搜集吴士文先生学术作品目录最全的。

编辑本书的目的,是要发扬吴士文先生的学术创新精神,学习他“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者风范,弘扬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推进当下学术繁荣。

逝者已矣!但天下事了犹未了。相信本书定能激励后者,发扬光大吴士文先生的学术创新精神,奋力进取,为修辞学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学术年谱》

编辑说明

《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学术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是辽东学院师范学院“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会”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也是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年谱》的编辑者历经五年的努力,从吴先生家属、亲友、学界同仁、报刊杂志等,搜集了百余万字的原始材料,经过认真分类筛选,考订核对,梳理编缀,现已初成其稿。

编辑《年谱》的目的是要发扬吴士文先生的学术创新精神,学习他“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者风范,弘扬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推进当下学术繁荣。

《年谱》体例为编年体,以学术成果发表时间为序,共搜集吴士文先生自1951年至1996年发表论著103篇(部),另有1篇未发表过的遗稿,计104篇(部)学术成果,是截止目前国内搜集吴士文先生学术作品目录最全的。以学术成果为线索,每个年度又横向列有学术成果、社会影响、学术信函三项内容。学术成果,只列举成果目录、发表时间和刊物或出版社名称。社会影响则主要是吴先生发表学术成果后,学界同仁公开发表的评论文章,共编入115篇。这些评论准确记录了吴先生之于修辞学的学术造诣和学界影响,可以透视出他对20世纪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卓越贡献和那个时代修辞学学术研究的繁荣样貌。学术信函共收入吴先生与同仁朋友之间的往来信函(含吴先生夫人、女儿、孙女给他的朋友信件各一封)176封,其中多关修辞学学术研究的组织协商、学术切磋、课题探讨、

成果推介、后学激励等。这些信函是从未公开发表过的,通过这些信件我们可以看出吴士文先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中国修辞学研究组织工作不遗余力的巨大贡献,对自己修辞学术殚精竭虑的创新精神,对修辞学界后学者诲人不倦的道德人格,对朋友同道坦诚真挚的亲情关怀。同时也可以看出吴士文先生作为一个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转而从政后的乍喜、思索、彷徨与苦闷。这些鲜为人知的心灵对话,至今读来仍会引起我们沉重的思索。

在《年谱》的最后部分,是吴士文诞辰八十周年暨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会成立纪念文章,共计13篇。作者中有学界泰斗,有吴先生生前好友与同事,也有他的女儿与学生。文章有对吴先生学术成果与学界地位的肯定,有对吴先生友情的深切缅怀,也有对亲人对恩师的泣血思念。学界同仁们对辽东学院师范学院成立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会给予充分肯定,共发来17封贺信,一并录入《年谱》中。在红尘滚滚、功利器器的现代社会,学术界知名学者身后寂寞已是司空见惯,吴先生在辞世10周年之后,还能在国内学术界遗留如此回响,足以证明他生前有怎样的影响力。

《年谱》不算《序》、《评传》、《跋》,共计33万余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大震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学术界思想解放、激情勃发的时代。吴士文先生与他的修辞学界的学人们恰逢盛世,他们相互砥砺,彼此生发,覃思精运,共同造就了修辞学研究的一个熠熠生辉的黄金时代。记录下这一时代盛况的有宗廷虎大师主编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而《年谱》则是通过一个个案解剖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著名修辞学家的成长,来反映那个时代修辞学人的求索历程。同时,也可以从侧面反映上个世纪从旧中国走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与追求。

吴士文先生的事迹感人至深,尤其是他在生命垂危时在与朋友们的通信中,还牵挂着修辞学的研究、修辞学事业的发展,牵挂着朋友之间的友谊,牵挂着自己的社会责任。《年谱》编者读之多次忍不住潸然泪下。逝者已矣!但天下事了犹未了。愿这部《年谱》能激励后来者,发扬光大吴士文先生的学术创新精神,奋力进取,为修辞学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年谱》在编辑过程中,受到当代著名修辞学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辽东学院师范学院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会顾问宗廷虎先生的大力支持和热心指导,这绝不是一个谢字可以轻轻带过的。

限于学识、眼界和沟通上的原因,很有可能许多珍贵史料我们还没有征集到,因此《年谱》难免有许多缺憾,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在修订本中尽量弥补这种缺憾。

杨荣祥

2010年6月26日

秋深枫愈红

——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的学术道路评传

他,虽身患癌症,却能达观地面对生死,顽强地抗争病魔,延长生命13年。即使他别的什么都没做,这种珍爱生命的抗争精神,是不是值得人们赞颂呢?一个市地级领导干部,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样的人民公仆,是不是值得主流媒体大力褒举呢?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穷尽一生心血,执著于修辞学理论研究,发新见于定论,标独得于学界,终成修辞学一代宗师。这样的成就,是不是可以获得一曲铁板铜钹高腔赞歌呢?将此三者集于一身的人,是已故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他又该获得怎样的赞誉与敬佩呢?

一、志道敏行,矢志不渝

中国文化人很早就熟知实现生命最高价值的根本途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人之生命,自有追求,追求在于弘道于心。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理想,追寻自己之梦。立志于道。“道”为人生之追求,人能弘道、求道、寻道、证道。无论人的性格如何、身份怎样、地位贵贱,都是为自己心中之道而追求。凡积极进取者心中必有常道恒道,生活中每个人经历不同,道却趋之如一,殊途同归。真正志于道的人,要一生不弃不舍,孜孜以求生命价值之最高实现。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先生终其一生,以殉道精神志于修辞学研究,取得骄人成就是实至名归的。关于他“志道敏行”,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人称他“探骊卅载始得珠”,文章称赞他从50年代开始致力于学术活动,“兹后近30年,他不懈探索,日无间断,进入80年代得以全面开展并取得辉煌成果”。此话虽然在时间界定上有待商榷,但却准确揭示了吴士文先生对“志道”的坚守精神。

其实,吴士文先生志于修辞研究岂止30年?终其一生,他都从未放弃过。

吴士文先生真正的学术活动,应该开始于1949年春天,当时23岁的他刚走上省立新民师范学校讲坛。一天课后在与学生交谈中,有学生问:“老师,为什么不教我们修辞?”吴士文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可以教。”正是这样一个不经意的承诺,引导他走进一位巨人建造的宏丽的学术殿堂,使他确立了一生的学术道路,造就了他一生的学术成就。

为了满足学生的要求,对修辞学一无所知的吴士文跑遍新民全城,终于借到一本至今仍被修辞界奉之为“千古不朽的巨著”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这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奠基人陈望道先生所著的权威性修辞学专著。《发凡》宏丽的体系建构,精到的学理阐释,博识的学术功力,智慧的语言表达,让吴士文着迷、倾倒、沉醉。《发凡》的作者博大的胸怀、超凡的气质和精深的学识,令吴士文叹为观止,心向往之。他把21万字的巨著工工整整地抄下来,把其中重要的章节一字不落地背下来,他把望老的修辞学理论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出来。——他站到了巨人的肩上!从此,他

“咬定青山”，矢志不渝。

“志于道”、“敏于行”，当是一切成功人士必备之品质，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朱熹引谢良佐注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吴士文先生坚定不移“志于道”，同时也脚踏实地“敏于行”。但“志道敏行”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士文先生命运多舛，却“志道”无悔。正当他唯精唯一、苦心孤诣地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时，却不幸患上了当时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空洞型肺结核，学校里同时患上这种病的还有三位老师，不同的是吴士文先生整个身心沉浸在学修辞、教修辞之中，并视此为人生乐事、趣事，废寝忘食不觉苦，反而没把重病放在眼里。他只是利用星期天治病，从不误课。他自费从新民去沈阳做“人工气胸”，风雨无阻，坚持了两年。有一次，新民到高台山的路轨被大水冲垮，他硬是徒步走了二三十里路，登上了去沈阳的列车。生命往往会在巨大的精神意志作用下，激活无限的潜能。吴士文先生的高远志向、韧忍坚强、达观精神，对治疗起到了积极配合作用，终于使结核病魔在他面前败下阵去。他成了学校里同时患病的四个人中唯一的幸存者。

1953年，27岁的吴士文走进锦州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这时他沉疴尽去，意气勃发，致力学术，锋芒初露。就在这一年，他的第一部著作《语法讲义》问世了。1954年又出版了增订本，不到3年，再版19次，印数达10万余册。接着，他又写出了《修辞中的“增动”和“借义”》，发表了《现代汉语句中的积极修辞现象》。1956年他调入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后，又与人合写了《现代汉语修辞》一书，一个年轻学者取得如此骄人成绩，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

然而，就在这位充满创造力的教师，要向修辞科学纵深领域探索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是非颠倒的“大革命”爆发了。吴士文这位初有成就的教师当然在劫难逃，而且祸不单行。先是那本凝聚着他心血的手抄本《修辞学发凡》，被“小将”们抄走了。这使吴士文难过了多少日，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不久，更大的灾难降临在他头上，因为他在修辞教学中曾引用过郭沫若《雄鸡集》里的一句话为例句：“听了毛主席讲话，好像热天吃了冰激凌，又如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这成了污蔑领袖，“反对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罪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使吴士文的精神饱受折磨，肉体惨遭摧残。

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喧嚣中，无知的热情抽打着民族战栗的伤口，愚昧的暴行摧残着文化痛苦的精魂。然而那些仍然坚守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却以“不死鸟”之精神传承着文化的薪火，酝酿着涅槃重生。吴士文就是这样一只浴火之凤！经历了严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后，吴士文被送进了“牛棚”。同被关进“牛棚”的，绝望者有之，灰颓者有之，甚至还有自杀者。作为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吴士文当时承受的打击可想而知，但他“志道”之心无悔，竟在蹲“牛棚”的80天中，以写“交待材料”为名，构思新的篇章。10年后出版的《修辞讲话》一书的大纲，就是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完成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吴士文当上“五·七战士”，举家插队落户到凤城县东方红公社。纯朴善良的农民看到他一介文弱书生，且年龄也不小了，便没有安排他与社员们共同劳动，只安排他在村前村后拾粪。这是一个时间可以自己支配的比较松散的工作，吴士文整天背着粪筐，拿着粪叉在村路上、小河边、坝埂田头、村前村后拾掇牲畜散落的

粪便。尽管这样,他仍没有放弃自己对修辞问题的思考,如对辞格结构的探讨,使之模式化、公式化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时期受到路边花草叶瓣排列有序的启发而萌生的研究课题。两年后,他被安排到当地中学教书。校领导十分通情达理,使他得以在写作班搞了语法结合修辞教学的第一次实验。从此,他又有了公开研究修辞的机会!他神游于修辞学宏丽的殿堂,恍兮惚兮,心无旁骛。于昏昏冥冥中,叩问学术本真;在殚精竭虑中,寻求醍醐灌顶。一次老伴有病,叫他去买药,去了老半天空手而回,却反问老伴:“你叫我干啥来着?”“买药,买药!”老伴哭笑不得:“唉,都着魔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大叫一声:“对呀!对呀!应该是这样的!”老伴被他从睡梦中猛地惊醒,问他怎么回事儿,原来他多日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修辞问题,突然在睡梦中得到答案,在梦里高兴地叫了起来。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把时间用在修辞研究上更有乐趣了。他每天从家到学校要翻山越岭往返30多里路,晚上回到家,不顾疲倦,点上小油灯,又开始了新的探求。就这样,他一直“魔”了八年——整整八年,就在这土炕上,他完成了《修辞讲话》一书的初稿及多篇论文。

70年代末,中国这艘社会主义航船终于驶出十年动乱的漩涡,向着改革开放的航向,开始了新的征程,中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出现了历史性的复兴。吴士文饱经政治风雨,历尽生活艰难,以无比的喜悦拥抱新生活,更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新时代。他积攒了20多年的创造能量,在这天高海阔的时代一下迸发出来!

吴士文“敏于行”,他的研究时间和空间是超过一般人的:汽车上、火车里、饭桌旁、被窝里,都是他思考修辞问题的最佳时间和空间。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吴士文突然被灵感激动得揭被而起,披衣伏案。常常是当他画出一篇篇论文的最后一个圆圆句号之际,也正是圆圆的红日冉冉东升之时。对这位修辞学家来说,再没有比打开窗帘,让黎明的曙光照耀在刚刚写完的书稿上更为惬意的事了。吴士文的几十篇论文几乎都是这样形成的,十几部专著也正是这样问世的。正如一位外国哲人所讲的那样:“幸福只存在于创造必要性得到满足的时候。”

“志道敏行”是要付出代价的。吴士文在探索、钻研修辞科学规律时,真正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按他自己说,甚至有点儿呆气十足。一次坐火车思考修辞问题,竟错过了站;一次走路时思考论文结构,竟撞到电线杆上,差点说声“对不起”;还有一次买白菜,交款开完票便揣在兜里继续思考修辞问题,等问题解决时,白菜早卖光了!如果说这“几次”还有点幽默,那另几个“一次”就不那么轻松了。一次是他骑在自行车上,脑海中翻腾着各种修辞方式的浪花,以至于迎面而来的一辆柴草车也视而不见,一头扎进柴草车中间。这次总算幸运,没有伤筋动骨。最可怕的一次,是他骑自行车想着论文,碰上牛群也来不及躲闪,闯牛阵的后果是摔得左臂鹰嘴骨折!谁能想到,在接骨过程中,他又开始研究起闯牛阵时所想的修辞问题,他终于在病愈前弄清了摔伤前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个修辞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即《辞格结构形式初探》中所谈的四个结构问题。

由于长期的授课讲学、熬夜,吴教授的牙龈开始溃疡,时常流血。1983年,溃疡部位发生了癌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念念不忘他一生钟爱的修辞研究,当年12月16日他给学术挚友宗廷虎先生的信中写道:

“这次手术比较成功。切除的淋巴结,四个没有一个有癌细胞,叫人高兴。看起来

还能与吾弟奋战一些年。美中不足的是手术过程中把下颌骨弄断了,现在只能吃流食。还得 20 天左右骨头才能接上。现正吃中医研究院肿瘤科给拿的药。”

“这次病好得这么快,一是手术及时,二是组织的关怀,三是朋友们的支持,特别是吾弟信中谈及的《辞格定义》的处理。每念及此,益增战胜病魔的信心。”

吴士文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有几次,他要把在病床上想到的问题笔之于书,但却找不到纸笔。他知道这是老伴给藏起来了,于是只好软磨硬泡说服夫人开恩,让他记录下难得的灵感。

就在这次手术前后,吴士文先生在病榻上完成了《修辞格论析》一书。出院不久,又与冯凭主编了《修辞语法学》。在后来患心脏病住院期间,他又与唐松波先生主编了《公共关系修辞学》。

吴士文先生一生 104 项学术成果中有 75 项成果是他患癌症以后获得的。而他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界好评如云的《修辞格论析》、《修辞新探》、《修辞语法学》等专著都是患病后出版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就是一个奇迹!

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仍然无限眷恋着未竟的修辞学研究事业,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生怕万一,给大女儿梦卉留下了一个名单。袁是一等,张、吴为二等,其余三人为三等。我想六个人都报也说得过,且是刺激他人下次都来参评之意。

现仍在医院,翻身不能,疼痛有时强忍,不打杜冷丁已五个月了,是我有意不打。我不知还能活多久,但与其这样痛苦活着莫如快点早死,但现在自己说了不算,连拿药都身不由己。‘好死不如赖活着’不完全正确。对癌症病人来说,多数上了年纪的人都作如是观。

现正治疗膀胱炎,待炎症消失,回家疗养。反正就是那么几样药。病快一年了,花了十几万。我很满足市里对我大开方便之门。

除夕回家,偶然叫孩子找东西,找出一个旧稿名叫《郑子瑜和中国修辞事业的发展与繁荣》,7000 字左右,已寄德明。这是我的关门之作。可惜我不能写你们了。如果有一天,我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了人间,在天国里我会祝福你们的。”

吴士文先生志于道,也殉于道。一个人的生命马上面临终极时,仍在关怀自己钟爱的、可以惠及整个民族的事业。生命竟是如此地纯净与纯粹,谁能不为之动容呢?

二、宏观微观,锐意创新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必须关注“三最”,即最前沿的学术信息,最权威的专家论述,最大程度的社会效益。时刻把握最前沿的学术信息,才能随时了解学术动向,寻求学术创新点;准确把握最权威的专家论述,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高起点地进行学术研究;关注最大程度的社会效益,才能使研究与社会进步更好结合,实现学术成果的更大价值。

吴士文的学术创新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当时,他几乎动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工具,获取最新学术信息,如打电话、发电报、阅读每期专业期刊等。更多的是书信,他与全国各地数百名语言修辞工作者建立通讯往来,高峰期他一年要写上千封信。正是这样多渠道、及时的学术信息,为他的创新研究提供了参照,使他始终立于学术研究潮头,成为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修辞学创新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精心

阅读修辞学权威专家的论著,《修辞学发凡》自不必说,就是同时代的学者每有观点发表,他都认真阅读,多方推介。这样做,使吴士文先生对于修辞研究,既能登高临远,又能体察微末。因此,他不管在修辞学科宏观体系建构上,还是在修辞学科微观问题研究上都多有建树;无论在修辞学研究组织建设上,还是在修辞学人的个别指导上都卓有贡献。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出创新问题:“依我的看法,莫如写点小东西,求深、求新,大家设法发表出来。”“不新、不奇,不全新,不全奇不要写,写了也不能出。”吴士文的学术挚友宗廷虎先生评价他是“修辞学学术创新的闯将”。在为吴士文诞辰 80 周年暨吴士文学术思想研究会成立写的纪念文章中,宗先生对吴士文的创新有过权威性的评价:

在 20 多年来,我国修辞学的新繁荣期里,吴士文先生被公认为最具创新意识的修辞学家之一。且不说 20 世纪出版的多本修辞学史著,均给吴士文先生在创新方面的贡献以高度评价,即使进入了 21 世纪,在士文逝世多年之后,对他的好评丝毫未减。例如,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希杰于 2002 年 11 月 15 日写给首都师大张炼强教授的信里就说:“90 年代,日本学者要我介绍中国修辞学家,我把你列为最有成就的四个人之一——吴士文、倪宝元,宗廷虎,张炼强。各有特色,可代表大陆修辞学的水平。”这里,王希杰先生自谦地未将自己列入上述名单之中,但将吴士文排在“最有成就的”“修辞学家”的前列,这一点与其他学者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又如,2006 年即将问世的由我主编的《20 世纪中国修辞学》在由高万云执笔的下册中,也列专节专门介绍了吴士文先生对中国修辞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吴士文先生修辞学研究的特点是着眼于创新,我们在几本修辞学史著里曾从不同角度作过论述,现在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修辞格研究的全面创新。一是对辞格理论的探索,作出了重大贡献,诸如辞格的定义、范围、类别、理论基础,以及辞格与非辞格的界限等,都有全面而深入的探究;二是对辞格结构的探讨,使之模式化、公式化的尝试,更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三是对辞格研究史的探索也有首创之功。总之,他把我国的辞格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他是建国以后对辞格研究贡献最大、最全面的学者。

2.对消极修辞(吴士文称之为“一般性修辞”和“辞规”)研究的创新。首先,吴士文在将其概括成“通顺有条理”、“简洁无废词”和“明白无歧义”、“贴切有所宜”两大类后,又概括出 26 种“一般性修辞”手法。其次,一反习惯上只讲“不应该怎么说”为“应该怎么说”,同时条分缕析、角度新颖、说理透彻。总之,他对消极修辞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3.关于语法修辞关系的创新。正如张志公先生所指出的:吴士文等“明白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修辞是起主导作用的,修辞的需要决定语法的结构”。这就与一般认为的语法与修辞的关系中,应由语法起主导作用的想法大相径庭。这一新观点语惊四座,有理有据。

4.在研究方法上尝试运用多种方法。例如,既用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研究“一般性修辞”(消极修辞)中的“辞规”、“辞风”和“特殊性修辞”(积极修辞)中的“辞格”和“辞趣”;又用系统论观点探索辞格的 4 种结构形式,显示了对辞格研究“公式

化”、“形式化”、“系统化”、“科学化”意识的强烈追求,从而使一系列的探索新意盎然。

5.倾力开创和坚持组织同行集体攻关的新形式。20世纪80年代初,吴士文先生即与宋振华、张国庆、王兴林共同组织全国22所高等院校的教师,由上述4人联合主编《现代汉语修辞学》教材,这是我国最早运用集体力量专为高等院校开设修辞学课程而编著的教材,也是修辞学界最早运用这种方式进行科研攻关所创造的新经验。此书于1984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吴士文先生再接再厉,又与冯凭主编《修辞语法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与唐松波主编《公共关系修辞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由组织同道共同编著修辞学教材,发展到齐心协力合作撰写修辞学专著,吴士文先生创造的这一经验为修辞学界同行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例如,作为后来者,我们先后组织力量撰写《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和《中国修辞史》(三卷本),也与吴士文创造的经验中受到启示有关。

(宗廷虎《用生命之火点燃中国修辞学的繁荣》,《辽东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吴士文先生自己锐意创新,并号召同道锐意创新。与此同时,他还表现出高度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创新思维策划聚合天下英才,开展修辞研究攻关。1980年,他与几位学术同道率先倡导成立中国修辞学会。他分别多次给张弓、张志公、张静、胡裕树、黄伯荣、孙常叙等专家写信,他联系发起人,研究发起单位,举荐学会领导人,促成筹备会……既在大局上运筹策划,又在具体问题上事必躬亲,从确定与会者名单,到联系会议承办单位;从起草会议通知,到制订与会者填表;从老专家的接送,到会标文字表述,他都亲历亲为。吴士文先生遗存的“中国修辞学会成立信件”就有110封之多,可见他为学会的成立付出怎样的心血。他的朋友濮侃先生在怀念文章中深情地说:“他为成立中国修辞学会到处征求意见,争取广泛支持,在上海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他还在全国各地联系有关单位和个人,为召开成立大会做具体准备。他是最早的发起人,是中国修辞学会的‘开国元勋’、头等功臣!可是他在后来所写的《中国修辞学会筹备经过报告》中,只字不提自己的功绩,却大书特书其他发起人和有关单位的贡献。学会成立后,他作为领导人之一,从不摆架子,而是跟大家打成一片,为发展修辞大业而奔走、呼号。”同为中国修辞学会创建人之一王希杰教授回忆说:“在中国修辞学会的发起过程中,他(引者按:指吴士文)是最辛苦也是出力最大的几个人中间的一个。”武汉大学郑远汉教授在纪念文章中也深情地写道:“筹建中国修辞学会,要人、要钱,举步维艰,士文一往无前,坚忍不拔,四处奔走。他动员我挑担子,又打电报给我的单位(我当时在华中师院)。中国修辞学会的成立,士文起了擎天柱的作用,他的功劳当然地应载入史册!为繁荣我国的修辞学事业,士文不但为组织队伍倾尽全力,而且带头勤奋写作,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论著。尤其可贵的是他真心实意地鼓励和支持学术界同人。他帮助并协同其他同志一起出书、写文章;朋友们出版了新著,他主动撰稿为之呐喊;朋友们取得的成就,他热情地为之讴歌……人说‘文人相轻’,在士文身上体现的却是文人相帮、相爱。士文的博大胸怀和对人的真诚,我感受至深。我的《言语风格学》出版,他在病中,让他的朋友李玉琨同志与他联名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后寄给我,我感动不已。他多次表示要在他开发的刊物上介绍我的学术思想,要我找我的研究生写,我婉言谢绝了,他不‘死心’,竟然直接致函我的一位研究生,文章发表后才通知我。我并没有